

# 十九世紀北京俄國東正教使團 與天主教“北堂藏書”<sup>\*</sup>

柳若梅

**[提要]** 天主教“北堂藏書”即十九世紀北京的天主教圖書，在天主教傳教士遭驅逐、北京天主教面臨後繼無人之際，被當時住在南堂的葡萄牙傳教士畢學源主教委託給經中俄兩國協約認可、在北京具有合法地位的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1860年，俄國特使伊格納季耶夫將這批圖書歸還北京天主教的法國主教孟振生。此後北京天主教方面幾次整理編目。由於種種原因，目前這批圖書現今仍處於塵封狀態，坊間時聞某處發現北堂藏書幾冊，由此令人感到“北堂藏書”已流失不全。而十九世紀委託北京俄國東正教傳教使團保管一事，也成為質疑目前北堂藏書完整性的一個原因。本文根據俄羅斯檔案館收藏的關於十九世紀俄國接收天主教遺留財產和圖書館的檔案資料，查索十九世紀以來俄羅斯人的相關記載和北京的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的記述，結合東正教對俄國的意義、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的由來等史實，力求全面鉤沉十九世紀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天主教遺留圖書，進一步揭開“北堂藏書”的神秘面紗。

**[關鍵詞]** 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 遣使會 北京北堂圖書館

**[中圖分類號]** B97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2018)01 - 0083 - 12

天主教“北堂藏書”即十九世紀北京的天主教圖書，在天主教傳教士遭驅逐、北京天主教面臨後繼無人之際，被當時住在天主教南堂的主教葡萄牙傳教士畢學源委託給經中俄兩國協約，由俄國向北京長期派駐、定期輪換的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1860年，俄國特使伊格納季耶夫將這批圖書歸還北京天主教的主教法國傳教士孟振生（Mouly）。此後北京天主教方面幾次整理編目。由於種種原因，目前這批圖書現今仍處於塵封狀態，坊間時聞某處發現

<sup>\*</sup> 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旅葡學者全國平先生的幫助和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黃鴻釗教授的鼓勵；本文中所使用的俄文檔案的獲得，得益於俄羅斯科學院米亞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院士、俄羅斯聯邦外交部帝俄對外政策檔案館館長波波娃（И. Попова）女士的幫助；本文所涉及的拉丁文資料，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拉丁語專家麥克雷（Michele Ferrero）先生、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李慧老師的翻譯和說明，涉及的法文資料承蒙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全慧老師和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李慧老師翻譯，特此致謝。

北堂藏書幾冊，由此令人感到“北堂藏書”已流失不全。而十九世紀委託北京俄國東正教傳教使團保管一事，也成為質疑目前北堂藏書完整性的一個原因。本文根據俄羅斯外交部檔案館收藏的關於十九世紀俄國接收天主教遺留財產和藏書的檔案資料，查索十九世紀以來俄羅斯人的相關記載和北京的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的記述，力求全面鉤沉十九世紀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天主教遺留圖書，進一步揭開“北堂藏書”的神秘面紗。

## 一、俄國東正教與中國

公元 988 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經過多方考察，將拜占庭基督教定為基輔羅斯的國教，開啟了俄羅斯民族一神崇拜的時代。從此，基督教文化賦予羅斯文化以極大的推動力量，在羅斯各公國，基督教文化與羅斯原有文化交融共進，形成俄羅斯民族獨特的精神價值。公元 1054 年，基督教分裂為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方教派和以羅馬為中心的西方教派，東方教派號稱保持了基督教傳統，是正統的基督教，自稱“正教”、“東正教”；西方教派號稱是普世宗教，自稱“公教”、“天主教”。東正教在俄羅斯國家的歷史上充分發揮其凝聚作用，鼓舞羅斯人在與外族的戰爭中取得一次次勝利。

公元 395 年，內外交困的羅馬帝國分裂為東羅馬和西馬。羅馬帝國的共治皇帝狄奧多西一世本不贊同教會擁有政治權力，加之後來狄奧多西一世賦予基督教以羅馬帝國國教的位置，因此，在狄奧多西一世統治的羅馬東部地區和後來的東羅馬帝國，教會以君權神授為名輔佐皇權，在很大程度上神權聽命於皇權。俄國從拜占廷即東羅馬帝國所接受的，就是相對於皇權來說的這種意義上的基督教。在俄國，東正教作為俄羅斯民族的精神核心支撐俄羅斯擺脫蒙古人的統治，以莫斯科公國為中心發展起統治一的中央集權的俄羅斯國家，在這一過程中，東正教力量不斷壯大，對於聽命於皇權的位置也漸有不從，引發教會勢力與皇權發生分歧。到了彼得一世統治時期，教權與皇權紛爭的結果，是彼得一世借牧首去世之機取消了牧首制，成立由世俗官員參與重大事務決策的聖主教公會，聖主教公會的重大指令，需經沙皇確認方可生效，沙皇有權否決聖主教公會的決定。由此教會徹底依附於皇權，成為維護皇權的工具。

俄國開始努力與中國建立聯繫，也是在彼得一世時期。俄國的外交目的，從一開始就是盡可能地接近中國，並同中國劃定比較有利的邊界和積極的貿易關係。<sup>①</sup>由於受到對華貿易巨額利潤的吸引，彼得一世時期甚至壟斷了一些重要獲利商品的貿易。但是，俄國針對中國的這一願望並未得到中國的回應，甚至每逢中俄邊境出現不順，俄來華貿易便屢屢遭受挫。為確保貿易順暢，俄國迫切需要在中國設立常設機構，協調中俄事務。因此，在得知中國有東正教徒（如雅克薩等中俄戰事中歸順或俘獲的俄俘）後，俄國提出向中國派出東正教使團，為中國信仰東正教的居民提供宗教服務，經過精心策劃，終於在 1716 年末（又說 1716 年初）將東正教使團送入中國東正教教徒的居住地——中國首都北京。在選拔入華東正教士時，彼得一世要求“惟天主起見，行事宜謹慎，戒魯莽，以免結怨於中國官員及在當地安營紮寨多年的耶穌會士。為此，需要的，不是學有根底、而是諳於世故的司祭”<sup>②</sup>。至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天津條約簽訂之前，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與天主教傳教士之間一直保持著相互尊重支持的良好關係。

## 二、俄國赴華使節與北京耶穌會士

從 1675 年俄國外交使臣斯帕法里出使中國起，俄國來華使節直接接觸到北京的天主教傳教

士、特別是北京的耶穌會士，換言之，俄國來華使節與中國的溝通主要通過北京的耶穌會士進行。斯帕法里出使之前俄國沙皇賦予的使命之一便是，“力求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將中國早期給俄國的四封中國公函譯成拉丁文，因為在莫斯科過去沒有、現在仍沒有中文翻譯，以致俄國大君主對中國朝廷當時的要求至今仍無所悉”<sup>⑨</sup>。斯帕法里在京期間，耶穌會士南懷仁擔任翻譯，使團抵達後的安置接待、覬見康熙皇帝禮儀的演練、康熙御前應答、與清政府談判回覆文書的傳達等，都通過耶穌會士進行。回國後撰寫的《中國漫記》<sup>⑩</sup>中的信息除去北京的親身經歷外，其餘幾乎全都來自耶穌會士。斯帕法里回國之際，南懷仁還請求致信俄國沙皇一封書信，信中除稟告斯帕法里在北京得到中國皇帝的隆重禮遇外，還請求俄國沙皇眷顧自己以及整個耶穌會，同時將自己的天文學著作上呈沙皇。

耶穌會士不僅在康熙御前為中俄溝通效力，還曾為康熙皇帝轉達致俄國沙皇的信。<sup>⑪</sup>1686年俄國新皇登基後派兩名專使維紐科夫和法沃羅夫到北京向康熙皇帝送上求和國書，兩名專使在北京覬見康熙時由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和南懷仁居中翻譯。<sup>⑫</sup>1689年中俄尼布楚談判的進行和最終條約的簽訂，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和法國耶穌會士張誠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尼布楚談判這一重大事件，集中體現了在華耶穌會士保障在華傳教地位、清政府為保障中俄邊界安寧、俄國為爭取邊界利益和與清政府建立持久關係所進行的艱難努力。1692年俄國派在俄經商的丹麥商人伊茲勃蘭特為使臣使華，伊茲勃蘭特於1693年11月抵達北京，11月12日覬見康熙皇帝，耶穌會士——法國人張誠、葡萄牙人安多等作為翻譯。使團訓令中所規定的需要瞭解的關於中國的信息，通過耶穌會士的幫助得以完成任務。<sup>⑬</sup>伊茲勃蘭特使團在京期間，應耶穌會士的邀請，經康熙皇帝恩准，還參觀了天主教南堂<sup>⑭</sup>，莊嚴華美的天主教南堂經俄國使團的記錄為歐洲和俄國所知。康熙五十一年出使卡爾梅克的圖理琛使團回程時帶回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據隨使團來華的勞倫茨·朗格的日記記載，在京期間從德國耶穌士紀理安那裡得到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sup>⑮</sup>1719年俄國派近衛軍大尉伊茲馬伊洛夫為特命使臣前往北京。該使團於1720年11月18日抵達北京，1721年3月2日從北京啟程返回俄國。在京近四個月的時間裡，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廣泛接觸，拜訪天主教南堂、北堂、西堂、東堂，接觸到北京所有耶穌會士和北京的天主教多明我會、方濟各會教士，留下豐富的記錄。十八世紀初期，中俄邊界摩擦依舊不斷，中國要求俄國歸還蒙古逃人也未得到俄方的回應，於是清政府和俄國斷絕了一切信函往來和貿易關係。於是俄國委派四等文官薩瓦·弗拉季斯拉維奇伯爵為特命全權使臣出使中國。該使團於1727年10月21日抵達北京，11月4日得以覬見雍正皇帝，耶穌會士巴多明隨侍在側，此行薩瓦與巴多明結為至交，並在巴多明的幫助下結識內閣大學士馬齊，從而使恰克圖條約有利於俄國。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後，依約派往中國的俄國商隊的隊長勞倫茨·朗格得到北京的耶穌會士贈送的漢語和滿語書8套計82本，這些書成為彼得堡科學院漢語和滿語藏書的開端。<sup>⑯</sup>

### 三、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

彼得堡科學院早期的中國書籍收藏與北京耶穌會士之間的聯繫遠不止於此。1730年，彼得堡科學院院士拜耶爾出版了《中國博覽》（*Museum Sincicum*）一書，在歐洲引起轟動。實際上該書中的很多內容都與由1715年起多次出使北京的朗格、與北京的耶穌會士相關。拜耶爾在1730年與正在籌備第二批赴華商隊的朗格會面時還得到朗格贈送的一把中國尺子和關於中國長度、重量單位的資料，《中國博覽》中的“西歐、俄國、中國長度重量單位對照表”就是以這些資料為基

礎撰寫的。1731年9月1日拜耶爾寫給北京耶穌會士的信、贈送給他們的《中國博覽》和德國天文學家基爾赫的《天文學觀測選編》，都在朗格帶領第二批俄國商隊（1732年3月22日至9月8日期間在京）進京時轉交，宋君榮於1732年7月3日寫了回信，回答了拜耶爾關於中國的天文學書籍、中國的曆法、耶穌受難日食相關的問題，介紹了北京的法國傳教士在中國語言、歷史的翻譯與研究方面的工作，也表達了他們對歐洲學術信息和歐洲消息的渴求。<sup>⑩</sup>此次朗格返回俄國時帶回了耶穌會士宋君榮、戴進賢、巴多明、嚴嘉樂、徐懋德寫給拜耶爾和德利爾的一批信件，為科學院圖書館帶回了北京出版的中文書，其中包括巴多明的漢拉字典和《海篇》、《字彙》。<sup>⑪</sup>1734年9月，朗格來到科學院提出可以幫助科學院同北京的耶穌會士建立通信聯繫，溝通學術信息。在當年10月4日的《彼得堡消息》（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上刊登了相關的消息：“曾任駐中國商務代表、即將帶領第六批商隊前往中國宮廷的朗格在造訪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並對對那裡的中國物品一一進行了說明，同時仔細查看缺少哪些物品，所缺少的物品在此次赴華時將得到補充。然後朗格出席了科學院大會，會上德利爾教授比較科學院原有的中國地圖和朗格帶回的中國地圖，而拜耶爾教授則研究了朗格帶回的中國書籍。此後地圖交給了德利爾教授，書籍則交給了拜耶爾教授。最後科學院成員與朗格一起商議與在北京的三個耶穌會（傳教團）就學術事務通信，並確定了這一點，這對於傳播學術、對於豐富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的館藏能有不少的幫助。”

在1731年至1777年間，彼得堡科學院通過俄國往來中國的商隊和使團，一直與北京耶穌會士保持著通信聯繫，兩者間互通信息，交換書刊，更有北京耶穌教士的文章在彼得堡問世，如彼得堡科學院的刊物《彼得堡科學院通訊》（*Novi Commentarii*）上先後刊登宋君榮<sup>⑫</sup>、劉松齡<sup>⑬</sup>、金濟時<sup>⑭</sup>、韓國英<sup>⑮</sup>的文章；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合寫的文章發表於拜耶爾的《中國的時間和時間週期》<sup>⑯</sup>一書中；宋君榮<sup>⑰</sup>、湯執中<sup>⑱</sup>分別有文章發表於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彼得堡的書刊中。除上述在彼得堡問世的文章外，目前在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喀山大學圖書館藏有巴多明關於中國醫學的文章<sup>⑲</sup>和關於中國生活習俗的文章<sup>⑳</sup>、宋君榮關於1735～1736年間北京天文觀測的文章<sup>㉑</sup>和關於中國歷史年表一書的文章<sup>㉒</sup>、蔣友仁翻譯成拉丁文的《尚書》（*Chou King* 書經），韓國英1772～1777年間寄來的4篇文章<sup>㉓</sup>，另外還有宋君榮的北京地圖。每次從北京帶回的信件中先後有宋君榮、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劉松齡等北京耶穌會士繪製的天文觀測圖和地理圖<sup>㉔</sup>。彼得堡科學院方面向北京耶穌會發出信件的有12人：拜耶爾、德利爾、杜維爾努阿、阿姆曼、里赫曼、克拉特岑什泰因、蓋賓什特列依特、采依格爾、魯莫夫斯基、米勒、格梅林和克拉什寧尼科夫；北京耶穌會士向彼得堡發出信件的有17人：巴多明、戴進賢、嚴嘉樂、徐懋德、宋君榮、孫璋、陳善策、傅作霖、劉松齡、湯執中、魏繼晉、蔣友仁、方守義、楊自新、錢德明、韓國英、金濟時。這些信件所使用的語言有拉丁文、法文，內容涉及漢語和滿語、中國歷史和文學、天文學、地理、醫學、物理和自然史。除與彼得堡科學院院士保持通信外，彼得堡科學院主席、科學院秘書也曾與北京耶穌會士通信，信件內容涉及交換圖書、交換植物種子、推舉宋君榮、劉松齡、韓國英為彼得堡科學院榮譽院士等。根據《彼得堡科學院會議記錄》記載以及學術界的發掘情況判斷，通信應有約145封，但目前保存可見的只有85封。

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和書刊交換，豐富了彼得堡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的中國圖書和中國物品，豐富了北京耶穌會士在就圖書館的歐洲和俄國書籍，豐富了他們關於歐洲學術界的信息。

#### 四、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北京天主教傳教士

正如第八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1794～1807年在北京）團長所言<sup>⑧</sup>，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修士大司祭註定都與北京的耶穌會士交往。由於中俄關係十分不穩定，俄國商隊時常因中俄邊境的糾紛而被禁止進入中國，每逢此時，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團人員就處於與俄國隔絕的狀態，無法得到關於俄國和歐洲的任何消息。長期在北京生活、在宮廷任職的天主教傳教士，對於俄國東正教使團人員來說，既能瞭解到北京宮廷和歐洲的必要信息。同時，北京耶穌會士與他們同屬於基督教世界的身份、甚至耶穌會士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會令遠離祖國的俄國駐北京東正教使團人員感到慰藉。第一屆東正教使團團長列扎依斯基抵達北京後，與天主教神父馬國賢互相拜訪來往，馬國賢日記中記載，“這位院長的舉止莊重而威嚴，服裝和陳設都異常地整潔。當他走出教堂的時候，胸前佩戴著十字架，手中拿著主教的權杖”<sup>⑨</sup>。列扎依斯基明確向馬國賢表示自己沒有指望能給中國人洗禮，只為俄俘的後代的宗教生活服務，這與彼得一世對入華東正教使團的諭令完全一致。甚至為了不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突，在馬國賢面前甚至“裝得像個天主教徒”。後來貧困潦倒時，列扎依斯基依然是“想去走訪那些耶穌會士”<sup>⑩</sup>。第五屆東正教使團團長去世後，北京的耶穌會士操辦葬禮安葬，安放墓碑，並在墓碑背面刻上了中文的祭文。<sup>⑪</sup>百年後的北京，在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式微之時，俄國東正教使團一方面顧及清朝對天主教的態度而不敢過多表現出對天主教傳教團之間友好關係，一方面畢竟以往所得到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團的幫助，且與天主教同屬基督宗教，對北京天主教的態度非常微妙。儘管如此，在德天賜事件中，天主教逢絕處之時，清政府因為懷疑所有的天主教傳教士而將德天賜的信件被交給俄國東正教使團團長索夫羅尼以瞭解其內容。危難之時索夫羅尼藉口不太懂信件所寫的語言，婉言拒絕解讀，從而使信中涉及的那些傳教士免於牢獄甚至滅頂之災。<sup>⑫</sup>

即使天主教傳教士在北京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北京天主教傳教士之間依舊保持著新使團到京後相互拜訪的傳統。在俄國第九屆、第十屆使團交接之時，1821年4月18日，北京的葡萄牙主教畢學源向俄國東正教使團駐地派出4輛按中式裝飾精美整齊的四駕馬車，接俄國東正教使團全體成員前往天主教南堂做客（實際只有新舊兩位使團團長、監督官、主要隨行人員得以前往），參觀南堂後，主客把酒相談，興致不盡。<sup>⑬</sup>1830～1831年間第十屆、第十一屆使團交換之際，畢學源主教再次邀請俄國客人到南堂做客。主人仔細準備餐食甜點咖啡，並正裝陪餐，顯示出招待之隆重。主客暢談歐洲、俄國、中國時事，坦誠相見。<sup>⑭</sup>在北京慘澹經營的天主教傳教士，與俄國東正教使團成員來往、接待他們來教堂做客成為生活中的愉悅之事；彌留之際值得託付的對象也只有俄國東正教傳教士。

天主教傳教士多年在北京經營、傳教，他們撰寫翻譯的關於中國的書籍，成為北京東正教傳士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天主教傳教士所積累的教理教義書籍，都為東正教傳教士所利用，以之為藍本，編寫整理出適合用於向俄俘後代宣傳東正教的讀本，如第九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團長比丘林就從耶穌會士1739年刊刻的教理問答讀本中摘錄編纂出講解東正教的教理普及冊<sup>⑮</sup>；1816年在比丘林與福文高的通信中交換理解和翻譯聖經的心得<sup>⑯</sup>。1795年起，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開始建設自己的圖書館。在1821～1830年間，修士大司祭彼得（第十屆東正教使團團長）認為在天主教遭驅逐之際，耶穌會士翻譯撰寫的漢語、滿語、蒙語基督教書籍，日後將很難再得到這些書，所以全力收集，在豐富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圖書館的同時，也為彼得堡的亞洲博物

館、外交部圖書館和俄國的一些大學圖書館購買了不少，目前仍是俄羅斯相關圖書館的珍貴館藏。

## 五、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天主教遺留圖書館

1838年，在北京的最後一名歐洲天主教傳教士、1800年入華的葡萄牙耶穌會士畢學源在京去世。畢學源身後遺留的天主教財產，依其遺囑交由其故交——第十一屆俄國東正教使團團長韋尼阿明保管和處理。<sup>⑤</sup>遺囑中並沒有提到藏書<sup>⑥</sup>，這批藏書什麼時候、怎樣移交給了北京東正教使團，現在很難確定。方豪在談到這批圖書時也提到的移交日期已不可考。<sup>⑦</sup>從現有中、俄、法、拉丁語資料來看，有三個說法。按惠澤霖的推斷，既然畢學源在遺囑中沒有提到這批藏書，就應當是藏書的善後事宜已經安排好。一些書中有俄文題識和1821～1830年間在北京的第十屆東正教使團團長修士大司祭彼得（加緬斯基）的簽名，落款時間是1828年4月和5月，說明此前藏書便已移交。<sup>⑧</sup>方立中神父在1948年的文章中提到，“在天主教遭受迫害期間，天主教傳教團曾把他們的珍貴物品轉移到了東正教傳教團，其中有一個批藏書。部分財物被魏若明司祭買下。”<sup>⑨</sup>可以認為方氏的說法與惠氏的推斷是一致的。但是，俄文資料並不支持惠澤霖神父的推斷。蘇聯時期著名的漢學史家、目錄學家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稱，“1838年，在北京的最後一個西歐傳教士、1800年入華的葡萄牙耶穌會士畢學源在京去世。畢學源生前曾請求韋尼阿明·莫拉切維奇為其死後變賣財產並所得錢款轉交給澳門的葡萄牙教會。在畢學源遺囑中保存有相關條款。莫拉切維奇將畢學源的財產變賣後，托一個中國基督徒將部分錢款轉寄往澳門。亞洲司得知此事後，認為此事‘會對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造成很大的危險’，而堅決禁止東正教使團同澳門的一切往來。畢學源去世後，葡萄牙耶穌會圖書館的豐富藏書轉給了東正教使團，為後來的教士和隨團學生廣為使用，而其中一小部分較為生僻的天文學書籍，則被運往彼得堡。1860年，由俄國特使伊格納季耶夫轉給了法國的傳教士。”<sup>⑩</sup>雖然該書中沒有進一步指出這一說法的依據，但作者和編者認為這批藏書的移交是在1838年畢學源去世之後，這一說法應該是有依據的。因為斯卡奇科夫的《俄羅斯漢學史》是以檔案資料為基礎而作，原本卷帙浩疊，只是在蘇聯無神論意識形態主導之下因其中過多的東正教傳教士內容而遭大幅刪減。另有俄文資料顯示，是“在韋尼阿明團長時間，圖書館（引者按：指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圖書館）突然得到巨大豐富，由於中國政府下令葡傳教士必須終止在中國人中間傳教，葡萄牙傳教士收藏的圖書寶庫連同天主教會財產轉到了東正教使團”<sup>⑪</sup>。韋尼阿明是第十一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的團長，任職時間是1831～1840年，這個時期段與斯卡奇科夫所說的時間一致。但是，在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1848年的工作記錄中稱“此時東正教使團接收了葡萄牙圖書館的天文學藏書，這是波利卡爾普神父作為使團團長做的最後一件工作”；<sup>⑫</sup>該書中還提到在波利卡爾波使團（1840～1849年在京）期間，隨團學生“戈什克維奇還為葡萄牙傳教士藏書做了目錄”<sup>⑬</sup>，這個時期與斯卡奇科夫的時間有差距，但是按這個說法，1848年俄國東正教使團接受天主教藏書，之後便安排隨團學生整理編目，似乎也說得過去。儘管圖書館委託給北京東正教使團的時間只能暫且存疑，但戈什克維奇書目上的題識卻可以提供一些可靠信息。查閱俄聯邦外交部帝俄對外政策檔案館保存的戈什克維奇書目，在書目末尾有三段小字，第一段是：“前任使團團長按此書單完整交出。——修士大司祭波利卡爾普”；第二段是：“新任使團團長按此書單交接。——使團監督官科瓦列夫斯基，1850年1月2日”；第三段是：“新任使團團長按此書單完全接收。——修士大司祭巴拉第，1850年1月2日”。修士大司祭是每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團長的東正教職級，波利卡爾普是

1840～1849年間駐紮北京的第十二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此時即將離任，因而是“前任使團團長”。也就是說，波利卡爾普在北京任期即將結束時，與新一屆使團的交接工作內容中有關於這批圖書的交接。從第五屆東正教使團起，俄國方面設立了監督官護送新使團來北京、組織新舊使團的交接工作，護送舊使團安全返回俄國，護送第十三屆使團的監督官是科瓦列夫斯基。第二段小字顯示，1850年1月2日，在監督官科瓦列夫斯基見證之下，前任使團團長將這批書完整交給了新一屆使團團長。科瓦列夫斯基護送抵達北京的第十四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是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第三段小字顯示，巴拉第完成這批圖書的收驗後，於1850年1月2日在在書目上簽字。<sup>④</sup>也就是說，1850年1月2日，在護送新使團到京、接舊使團回俄的監督官科瓦列夫斯基見證之下，安排整理編目的第十二屆使團團長波利卡爾普和第十三屆使團團長巴拉第，依目錄查驗核對，確認無誤後三人在目錄上簽字，完成交接。

1860年，俄國特使伊格納節夫將這批圖書交給了北京的天主教法國主教孟振生。1861年孟振生一起來北堂的狄仁吉神父開始為這批書籍整理編目<sup>⑤</sup>，1949年，惠澤霖神父等歷經艱難推出了《北堂西文善本目錄》<sup>⑥</sup>現被稱為“北堂圖書館藏書”。第十二屆俄國東正教使團隨團學生戈什克維奇為這批圖書所做的目錄，現今保存在俄聯邦外交部帝俄對外政策檔案館<sup>⑦</sup>，該書目包括圖書3,348種，按主題分為117類。而狄仁吉神父所編北堂書目包括圖書5,929種，按主題分為21大類，具體對照如下：

北堂書目：聖經 205

俄書目：1類聖經 30種 + 2類聖經倒說 9種 + 3類聖經闡釋 56種 + 4類聖經重要詞語索引和聖經閱讀資料 15種和 8種 = 118種

北堂書目：教父學 123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137種，包括第5類神父和教會導師著作 35種 + 第6類神學家著作 36種 + 第7類神學體系和教程 66種

北堂書目：神學教義及倫理學 637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233種，包括第9類神學教義和分析 53種 + 第11類道德神學 152種 + 第26類道德哲學 28種

北堂書目：辯證神學及神秘主義 204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67種，包括第10類神學辯論 55種 + 第25類玄學 12種

北堂書目：教規法及民法 204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177種，包括第17類教規法 55種 + 第14類耶穌會、其章程和規則 80種 + 第15類教會決議 19種 + 第16類教皇令 14種 + 第90類國民的權利和義務理論、訓練規律 13種 + 第91類法理學 13種

北堂書目：佈道及教義問答 300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341種，包括第8類教義問答 65種 + 第12類牧教神學 61種 +

第 19 類虔誠思考 215 種

北堂書目：辯證神學及神秘主義 204 種

俄書目：第 10 類神學辯論 55 種

北堂書目：歷史 531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247 種，包括第 74 類古代歷史學家 39 種 + 第 75 類古代歷史著作 12 種 + 第 76 類普通歷史學 13 種 + 77 類國家和城市的特殊歷史 19 種 + 第 78 類個別時期和事件的歷史 24 種 + 第 79 類普通教會歷史 19 種 + 第 80 類個別教會和地方的歷史 17 種 + 耶穌會歷史 25 種 + 第 84 類歷史實例 43 種 + 第 85 類古代風俗道德等研究 11 種 + 第 87 類歷史年表 25 種

北堂書目：禱告書 173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187 種，包括第 21 類教堂禱告書 79 種 + 第 18 類教堂辭令 84 種 + 第 20 類教堂禱告、儀式、節日 24 種

北堂書目：禁慾主義 700 種

俄書目：第 13 類禁慾主義 87 種

北堂書目：哲學 265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137 種，包括第 23 類哲學著作及其闡釋 57 種 + 第 24 類哲學教程和邏輯辯證法共 45 種 + 第 27 類哲學史 35 種

北堂書目：幾何學及水文學 96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45 種，包括第 32 類幾何 26 種 + 第 94 類航海 19 種

北堂書目：文學 178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88 種，包括第 105 類文學、希臘和拉丁經典作品 49 種 + 第 108 類辯論、作詩法及例子 26 種 + 第 111 類語文學評論 13 種

北堂書目：數學 378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195 種，包括第 28 類古代數學家的開創性著作 34 種 + 第 29 類現代數學家的著作 13 種 + 第 30 類普通數學 37 種 + 第 31 類算術代數 39 種 + 第 33 類三角 15 種 + 第 34 類高級分析 5 種 + 35 類數學表格 200 種 + 第 49 類數學和天文學的各种定理

北堂書目：天文學及日晷測時學 438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316 種，包括第 36 類普通天文學 30 種 + 第 37 類天文學教程和民間天文學 19 種 + 第 38 類物理天文學 14 種 + 第 39 類天文學 21 種 + 第 40 類實用天文



學 7 種 + 第 41 類宇宙學和數學地理學 13 種 + 第 42 類星座目錄和星圖 10 種 + 第 43 類天文學表格 12 種 + 第 44 類星曆表 27 種 + 第 43 類天文觀測 12 種 + 第 44 類星曆表 27 種 + 第 45 類天文學表格 29 種 + 第 46 類天文學和數學工具 31 種 + 第 47 類日晷學 23 種 + 第 49 類數學和天文學의 各種定理 17 種 + 第 50 類占星術 11 種 + 第 88 類日曆 13 種

北堂書目：物理及化學 178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117 種，包括第 51 類物理 33 種 + 第 52 類氣象學磁學電學 37 種 + 化學 14 種 + 第 54 類自然魔法物理和數學中的有趣命題 19 種 + 第 55 類煉金術 14 種

北堂書目：機械學及工藝學 131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56 種，包括第 97 類工藝學 9 種 + 第 98 類機械技術計量學 11 種 + 理論機械流體靜力學和流體動力學 29 種 + 第 95 類工程藝術 7 種

北堂書目：自然史 148 種

俄書目：第 56 類普通自然史 15 種

北堂書目：醫藥學 308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269 種，包括第 28 類植物學 24 種 + 第 59 類植物學體系和教程、植物解剖與生理學 7 種 + 第 60 類動物學 20 種 + 第 61 類動物解剖與生理學 7 種 + 第 62 類人體解剖與生理學 26 種 + 著名醫生著作全集 24 種 + 第 64 類衛生學、普通病理學和內科學、診斷學 12 種 + 第 65 類特殊內科學 53 種 + 第 66 類外科學和產科學 22 種 + 第 67 類生藥學製藥學和處方學 34 種 + 各種醫學定理 20 種 + 通俗醫學相面術 20 種

北堂書目：語言學 120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187 種，包括第 106 類最新拉丁語 38 種 + 第 107 類歐洲語言 63 種 + 109 類詞典 41 種 + 第 110 類語法學文選和對話 37 種 + 第 112 類漢語埃及文字標準字 8 種

北堂書目：傳記 196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115 種，包括第 82 類聖徒行傳 61 種 + 第 83 類著名人物傳記 54 種

北堂書目：雜類 316 種

俄書目：相關圖書 54 種，包括第 114 類百科全書 11 種 + 第 11 類學術團體論集、雜誌 11 種 + 印刷和其他 24 種 + 書目 8 種

北堂書目：沒有對應類別

俄書目：第 48 類地球儀的應用 10 種 + 第 70 類普通地理學 31 種 + 第 71 類特殊地理學 15 種 + 第 72 類古代地理學 17 種 + 第 73 類旅行 13 種 = 76 種

北堂書目：沒有對應類別

俄書目：第 89 類政治 18 種

北堂書目：沒有對應類別

俄書目：第 92 類普通軍事藝術戰略學 30 種 + 第 93 類軍事實踐 9 種 = 39 種

北堂書目：沒有對應類別

俄書目：第 100 類農業和農業經濟 21 種

北堂書目：沒有對應類別

俄書目：第 101 類建築學 25 種 + 第 102 類雕塑美術繪畫 10 種 + 第 103 類透視 14 種 + 第 104 類音樂和歌唱、樂譜 18 種 = 67 種

北堂書目：沒有對應類別

俄書目：第 113 類教育學 12 種

北堂書目總計：5,929 種

俄書目總計：3,348 種

統計第十二屆俄國東正教使團隨團學生戈什克維奇所做書目中的 3,348 種圖書，可知其中搖籃本圖書共有 58 種，出版於 1484 年～1550 年間，十六世紀圖書 581 種，十七世紀圖書 1,762 種，十八世紀圖書 858 種，十九世紀圖書 37 種，此外還有一些圖書由於缺少標注年份頁等多原因無法納入統計。

但這並不是 1860 年俄國方面交給北京天主教孟振生的所有圖書。在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新舊交接工作完成後，又根據亞洲司 1849 年 5 月 6 日簽發的第 1514 號許可，1850 年，第十二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回國時，從上述所列書目中，從中選出 14 種數學著作（其中搖籃本圖書 3 種、十六世紀圖書 6 種、十七世紀圖書 4 種、無出版年圖書 1 種）和 29 種天文學著作（其中搖籃本圖書 6 種，十六世紀圖書 5 種，十七世紀圖書 16 種，十八世紀圖書 2 種），即選出數學著作和天文學著作共計 43 種，運往彼得堡普爾科夫天文臺<sup>④</sup>，現在仍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普爾科夫天文臺圖書館。也就是說，1860 年俄國方面歸還給北京天主教的圖書總數的 3,305 種，其中搖籃本圖書 49 種、十六世紀圖書約 570 種、十七世紀圖書約 1,742 種，十八世紀圖書約 856 種，十九世紀圖書約 37 種，還有一些缺失出版年份頁的圖書近百種。這才是 1860 年俄國歸還給北京天主教的所有圖書。

以上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間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接收天主教藏書和 1860 年歸還該批圖書的基本情況。這一事件集中反映了以清朝為中心的中國與歐洲、中國與俄國、俄國與歐洲的微妙關係。另一方面，這三千多部內容豐富、幾乎覆蓋了歐洲文明各領域成就的圖書寶庫在清朝的存在和被傳教士用於其在華活動之中，將歐洲的文化成果推廣於中國，形成中西文化交流、中俄文化交流歷史上的一大盛事。

- ① Николай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1619-1792 г.), Казань, 1882. 中譯本見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0頁。
- ② Е. П.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o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тр. 37. 中譯文轉引自張綏:《東正教和東正教在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年,第185頁。
- ③ 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第42頁。
- ④ 尼古拉·斯帕塔魯:《中國漫記》,蔣本良、柳鳳運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
- ⑤ 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皇帝委託前往耶穌會莫斯科傳教區的閔明我帶給俄國沙皇一封信函,“這封信寄到伊斯帕甘城,交給耶穌會士卡羅利·馬夫里奇·沃塔,卡羅利又把它送到阿斯特拉罕,交給耶穌會士康得拉季·捷爾皮洛夫斯基,後者於1690年3月18日在莫斯科上呈此信。”見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第62~63頁。
- ⑥ 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第66頁稱:“柏格德汗通過一位近臣及耶穌會士托馬斯·佩雷拉(引者按:即徐日昇)和斐迪南·維爾比斯特(引者按:即南懷仁)向專使問道……”。
- ⑦ 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第95頁稱:“柏格德汗對同俄國所訂和約非常滿意,沒有破壞和約的意圖;中國人打算在額爾古納河上游附近建一座城供呼圖克圖居住,還要在阿莫爾河岸靠近結雅河之處再建另一座城;呼圖克圖和幹齊賴汗已帶領所屬各兀露絲臣服於柏格德汗;從中國往俄國運進寶石,中等和上等綢緞,深色單幅棉布利潤較大;從俄國運往中國則以各種貂皮、銀鼠皮、猞猁皮、北極狐皮、兔皮及其他皮貨較為有利;腦溫城城牆是中國人用木料建成的,在伊茲勃蘭德逗留期間,給城牆填了土,配備了槍炮和弓箭,以鞏固城防,並開設了相當數量的小鋪子與俄國人做生意,但是禁止中國商人從那裡到俄國去。”
- ⑧ 伊茲勃蘭特·伊台斯、亞當·勃蘭德:《俄國使團使華筆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24~226頁。
- ⑨⑩④ 斯卡奇科夫著、米亞斯尼科夫編:《俄羅斯漢學史》,柳若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3頁;第36頁;第210頁。
- ⑪ 嚴嘉樂:《中國來信》,叢林、李梅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42~146頁。
- ⑫⑮ Т. А. Пан, О. В. Шаг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 2004, Стр. 39; Стр. 39.
- ⑬ Gaubil Antoine, Observaciones astronomicae Pekini habitae ( annis 1753-1756) a R. R. P. P. Gallis Societatis Jesu. Mercurius in Sole visus. *Novi Commentarii*, t. V, pp. 473-480. Summa p. 46-49. Additamentum. *Novi Commentarii*, t. IX, pp. 499-502. Summa pp. 49-53.
- ⑭ Hallersein Augustin, Mercurius in Sole observatus Pekini Sinarum anno 1756 die 7 Novembris. *Novi Commentarii*, t. IX. pp. 503-512. Summa pp. 53-54. De differentia meridianorum Petropolitani et Pekinensis. *Novi Commentarii*, t. XIX, pp. 630-635. Summa pp. 70-71.
- ⑮ Collas. Observaciones Pekini Chinarum institutae excerptae ex litteris R. P. Collsas ad Stephanum Rumovski anno 1772 die 5 maii datis. Observaciones a P. Dolliero super cometam anni 1769 institutae. *Novi Commentarii*, t. XVIII, pp. 647-655. Summa pp. 62-63.
- ⑯ Cibot P. Descriptio Phalle quinquanguli seu fungi Sinensium Mo-ku-sin. *Novi Commentarii*, t. XIX, pp. 373-378.
- ⑰ Kogler Ignatius, Pereyra Andreas, Slavicek Carolus. Ephemerides planetariae ex undecim annorum. *De horis Sinicis et cyclo horario*, Petropoli. 1735. pp. 23-32.
- ⑱ Gaubilius. Esercpta es Sinensi quaedam description itineris Pekingio per Siberiam versus Chlamyccos Astracanenses facti. Sammlug Russicher Geschichte. IV part, sect 3, 6 vol. Petropoli. 1734-1735.
- ⑲ Incarville. Catalogue des plantes et autres objets d'histoire naturelle en usage en Chine. *Memoires de la société Impériale des naturalists en Chine*. Vol. III. 1812, pp. 103-128; Vol. IV, 1813, pp. 26-48.
- ⑳ Parrenin. Письмо о *Lues venerea* в Китае и о способах лечения этой болезни (21-III-1737 г.)
- ㉑ *Circa ritus sinicos*. 這是拜耶爾1738年收到的來

自巴多明的資料，都是關於中國習俗問題的。轉引自 T. A. Пан, О. В. Шат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 2004. Стр. 88.

②關於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du livre Tsou Chou* 的評論，轉引自前引書。

③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du livre Tsou Chou*，轉引自前引書。

④這四篇文章是《論古代長壽人的生活》(*Essai sur la longue vie des hommes dans l'antiquité*) (1772年)、《中國園林》(*Essai sur les jardins de plaisance*) (1774年)、《蘑菇的種植》(*Notice sur la culture des champignons*) (1775年)和《傘菌》(*Des agarics*) (1777年)。

⑤凡生活在北京的修士大司祭都必須和耶穌會士交往。因為除此之外，他從俄國得不到任何消息，而從耶穌會士那裡則可以知道不少新聞，而且通過他們可以比較方便、確切地打聽到當地的事情。見尼伊維謝洛夫斯基編：《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一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53頁。

⑥馬國賢：《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李天綱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8頁。

⑦尼伊維謝洛夫斯基：《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一冊，第38頁。

⑧⑨⑩⑪阿夫拉阿米祖父輯：《歷史上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柳若梅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35頁；第56頁；第78頁；第80頁。

⑫E. Ф. Тимков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одах. СПб., 1824, стр. 65-68.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 Ф., Перв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лаван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М.: Эксмо, 2011, С. 382.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4頁。

⑬E. Ф. Тимков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одах, СПб., 1824, стр. 221-226, 269-271.

⑭М. В. Ладыженский, Дневник, веденный в Пекине с 1-го декабря 1830-го года,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 7, 1910, Стр. 13.

⑮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的檔案資料：ф.7, оп. 1, ед. хр.№39, Письма Пекинского

католического миссионера Ферейра. На латинском языке, в папковом переплете. 42 л., 1816-1821, 23\*24.

⑯關於天主教遺留財產的處理，詳見柳若梅：《十九世紀葡萄牙天主教在華遺留財產與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澳門：《行政》，2012年第1期。

⑰畢學源遺囑內容如下：“請求尊敬的俄國神父韋尼阿明——若其不在，則請求其繼任者——在我死後為我依例舉行葬禮；同時，將南堂墓地託付於他，以便保管和實行必要之修復；此外，在我死後，請其將在我房中能找到的所有物事進行變賣，所獲資金交給我的國家，交至負責人手中。畢學源立於1830年7月6日。”見 J. Van den Brandt, L'Archimandrite Benjamin Morachevich et la fin du Nan-T'ang,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400 (Juin-Octobre 1948), p. 451.

⑱《北堂圖書館藏書志》，見《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1838頁。

⑲惠澤霖原著，李國慶譯注：《北堂書史略》，載《北堂圖書館藏西文善本目錄附錄部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949年，第31頁。

⑳ J. Van den Brandt, L'Archimandrite Benjamin Morachevich et la fin du Nan-T'ang,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400 (Juin-Octobre 1948), p. 456.

㉑Китайские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 май-июнь, 1939. Стр. 47.

㉒⑳㉓俄聯邦外交部帝俄對外政策檔案館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ИД РФ) 資料，Ф. ГА 1-5, оп. 4, г. 1823, Д. 1 (п. 44), л. 143 об; л. 91-144 об; л. 144 об.

㉔Jean-Baptiste-Raphael Thierry, *Catalogus Bibliothecae Dom s Pe-tang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Pekini Sinarum* (《遣使會北堂圖書館1861年圖書目錄》), 1861.

㉕Lazarist Mission, Peking,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 1949. 關於該書目的編撰，詳見雷強：《北堂善本書目的編撰過程》，上海：《文匯報》，2016年7月15日。

**作者簡介：**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089

[責任編輯 陳志雄]